

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的开山鼻祖，在太平洋上飘泊了七个多月，终于在 1807 年夏天抵达广州。这标志着长达半个世纪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真空状态已经结束，新的一页从他脚下开始了。

传教士浮海东来

——中国报道的开拓者马礼逊

1815 年 8 月初的一天，南洋马六甲岛的一座普通中国式庭院里，有三个人——两个洋人和一个中国人正在忙碌着。夜已经很深了，海风习习，椰树摇曳，但是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却感到心里正燃着一团火。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中国刻工梁发从雕版上揭下一张纸，不禁欣喜若狂——这是一页试印的报纸封面，采用中国线装书版式，正中以匀称、大方的宋体刻有“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几个大字。他轻声唤来正在一旁伏案写稿的传教士米怜，两个人一边端详，一边赞叹，但也许并没有料到，在这个月明星稀的晚上，随着这页纸的诞生，中国新闻史上重要的一页也被悄悄地揭开了。

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历史，是随着马礼逊等第一批浮海东来的西方传教士的脚步一同掀开的。在 19 世纪初，由于外国新闻业还未充分发达，扮演‘记者’角色的还只是一些过路的商人、旅行家以及传教士的先驱们，他们或有文章寄回国内报刊，也只限于猎奇式地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与我们所说的中国报道相去甚

远。然而，这却是一段无法割断的历史，它无意中形成了外国记者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的开端。特别是到了近代伊始，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浪潮自西东来，时起时伏，英美等国传教士更扮演着开路先锋的角色，而出版书籍，或刊行报章，正是他们的利器。中国报道的第一页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应运问世

外国人创办的第一家中文报纸，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 1815 年 8 月 5 日在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办人是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史学家认为，马礼逊是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的开山鼻祖，也是外国在华创办报刊的第一人。马礼逊生于 1782 年，早在来中国之前，他就在大英博物馆里以拉丁文中文《合璧字典》为课本学习汉语，一一誊写，刻苦练习，为来华传教作准备。1807 年初，这位充满冒险精神的传教士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然后从纽约坐帆船在太平洋上飘泊七个多月，于同年 9 月抵达广州。这标志着长达半个世纪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真空状态已告结束，新的一页从他脚下开始了。

摆在拓荒者马礼逊面前的，是一条充满艰险的路。因为早在雍正年间，清廷就明令规定，允许滞留在中国的外国人，除应到京效力者外，都必须集中居住在澳门，不得在各省走动，故马礼逊来华后最初的传教活动，只限于澳门岛上为数不多的一些英美商人及水手；后来，嘉庆皇帝又传谕旨：“禁止西人传教，查出论死，入教者发极边。”这对于他的传播基督教的美梦，当然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当时对西方人充满敌意的中国社会环境里，几乎没有人愿意冒险入教，马礼逊只能在生活艰困的穷人和洋行里的杂役中发展教徒。直到 1814 年，马礼逊才说服印刷所刻工蔡高

加入新教并为之洗礼，蔡高成为第一名华人基督教新教教徒。后来的数年里，马礼逊在广州的家中秘密举行的礼拜活动中，前去聆听他传播福音的正式教徒最多时也不过十余人，这令他颇感失望。

年轻的马礼逊自然不甘于此，他开始逐步实行他雄心勃勃但又与前辈们迥然不同的传教计划。为对付清廷严禁外人在华传教的规定，他不得已受雇于英国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任汉文翻译，才免于被驱逐。据说当时广州城中精通中文的外国人只有三个，而他就是其中之一。这样，在每年的贸易季节里，马礼逊都可以在广州住上四五个月，白天为公司生意而舌耕，每晚则致力于适合一个人单枪匹马来从事的工作——着手编辑对后来传教士影响巨大的《汉语语法》及《华英字典》，又翻译《圣经》之《新约》为中文，秘密雇人刻印，因中途为官府所察，只好将所有刻版付之一炬以灭迹，损失甚重。伦敦布道会闻讯后，于1813年又特遣传教士米怜东来协助，马礼逊惟恐再蹈前辙，遂命米怜率新发展为教徒的刻印工蔡高前往马六甲设立印刷所，刊行书籍，并创办为中国人讲习英文的华英书院。

当时，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许多西洋传教士都停留在南洋各地的华侨居住区，一面学习中文，一面等待时机，赴大陆传教。马礼逊选择马六甲为创业据点，一方面是出于无奈，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一个更大也更为现实的计划——以报刊来作为传教的工具。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工作，1815年8月5日，由他创办的同时也是西方人以中文出版的第一个定期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了。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中国线装书版式，木板雕印，自1815年起，凡7年，每月1期，每期6—7页，初印500册，不久增

至 1000 册，最盛时达到 2000 册。该刊封面正中为刊名，右上角题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而从之。”左下角题“博爱者纂”。这种封面设计问世后，几成为版样，以后西洋传教士在华所办报刊的封面，大多沿用这种模式。至于所登内容，大部分是阐发基督教义，间或也有新闻和介绍天文、地理等新知识的文章。编辑者除马礼逊、米怜外，稍后加盟的另一名传教士麦都思于 1817 年携带一台书版印刷机抵达马六甲，设立了一个印刷所。此外，更引人注目的是粤人梁亚发，据新闻史家戈公振先生的考证，梁亚发为我国首位基督教传教士，也是正式服务于报界的第一人。他 11 岁起就塾读书，数年后因家贫辍学，乃往广州习制笔和雕版业，1815 年被传教士米怜所招募，随之赴马六甲筹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出刊工作，不久受洗入基督教新教，从此毕生服务于伦敦布道会，以刻印中文书报、撰写宗教小册子及传教终其一生。其中，他撰刻的《劝世良言》曾在太平天国时期被洪秀全大量翻印，传播甚广。

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后，由于外人不便出面，该刊在广东各地的发行，全凭梁亚发一人在海陆间往返奔波，主要方法是每逢粤省县试、府试、乡试，由他本人携往考场，与宗教书籍一同分送；其余部分则由编者联络友人，借海船之便销往南洋群岛、泰国、新加坡等华侨聚集地区。这种情形，从编者之一米怜在创刊号上发布的一则“告帖”中，可以看得十分明白：

凡属呷地（马六甲）各方之唐人，愿读察世俗之书者，请每月初一、二、三等日，打发人来到弟之寓所受之。若在葫芦、檳榔、安南、暹罗、咖哩吧、廖里龙牙、丁几宜、单丹、万单等处各地之唐人，有愿看此书者，请于船到呷地之时或寄信与弟知道，或请船上朋友来弟寓所自取，弟即均为奉送也。

这种十分原始的发行方式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但在当时有限的交通条件下，编者与读者彼此沟通的道路似乎也只有这一条。从该刊第二期登载的一篇“社论”中，我们略可看出马礼逊等远离故土、缺乏帮助的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基本认识，以及他们对知识界怀有的急迫期望：

……至本报宗旨，首在灌输智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本报虽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惟一急务，然其他各端，亦未敢视为缓图而掉以轻心。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又安可忽视之哉。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载，一旦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其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于万一耳。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以中文出版并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刊，在形式和内容上虽然还不具备新闻传播媒体的完整形态，但它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意义却是非同寻常：不仅在版样、中文字模和新印刷术等方面为以后西洋传教士在华办报树立了榜样，更重要的是马礼逊本人的办报活动，拉开了外国记者在华新闻事业的帷幕，此后百年间跨洋越海来中国从事新闻报道的外国记者都是沿着他的足迹不断前行，才形成了中国报道今天色彩斑斓的格局。因此，人们把马礼逊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举动称为“拓荒之举”。

设计“领事裁判权”

马礼逊在中国生活时间长达 28 年之久，编辑《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只是他的传教活动的一部分。在这漫长的时光里，他把主

要精力都投入了翻译《圣经》和编写《华英字典》的浩大工程之中。在他来华 11 年后，历史上第一本全文译出的中文圣经《神天圣书》问世了。不久，当大批传教士随着炮舰在中国的沿海登陆后，这本厚书成了他们的随身必带品，用来随时随地向人们传播基督教义。而令接踵而至的商人、旅行者、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对马礼逊心存深深感激之情的，却是他花费了二十多年心血编纂而成的《华英字典》。早在来华之初，马礼逊就预感到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西方国家对华贸易往来的增加，将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必须学习中文，因此，有必要编写一本中英文字典，为后来者与中国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便利。为编写这本字典，他以《康熙字典》为蓝本，查阅了近万种中文资料，对该字典中所涉及的英语单字、词汇、成语和句型等都有汉译，成书后的《华英字典》达 4595 页，而这全是凭马礼逊一人之力在不被人知的情况下完成的，其毅力之大，不能不令人惊叹。

在新闻事业方面，马礼逊为西方学者备加注意的举动是他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上发表的《从中国政府对广州东印度公司雇员的举动所想到的》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提出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有关外国在华自行设立法庭和行使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他建议道：英国政府应考虑授予在华的公司大班以行政兼司法长官的权力，或派一名推事驻节广州，专对英国侨民负有民事权威，不只限于商业方面，而且能够成为对所有事件进行交涉的权力机构。我们看到，这一建议在成为现实后，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长达百年的历史。在中国报道史上，这也是外人以新闻媒介为本国对华政策出谋划策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十分突出的一例。

马礼逊以开拓文化传播事业在中国取得成功后，颇受本国政府重用。1824 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33 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成立，他又被任命为汉文正使兼翻译。但好景不长，次年 8 月他即因病死于广州，后葬于澳门。有趣的是，马礼逊死后，他的儿子、年仅 20 岁的小马礼逊很快继其职位，成为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的风云人物。

由于长期居留中国的缘故，许多传教士的第二代都精通汉语，成为“中国通”，小马礼逊也不例外。他 1814 年生于澳门，在英国及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受短期教育后，16 岁起就在广州替外国商人做翻译。继承父业后，曾于 1840 年随英国水师提督懿律和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同乘兵船前往天津，与清政府代表、直隶总督琦善会晤；后又作为翻译，陪同当时的英国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璞鼎查到南京，参加《南京条约》的签订，因在谈判中“有功”，在香港割让后，官至香港殖民政府议政局委员，兼代辅政司，成为近代中国史上一个颇引人注目的角色。

马礼逊父子在事业上的更迭，既预示着外国势力及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利用手中媒介，刺探中国政情。目睹虎门销烟，派员四处侦察。两次拜访林则徐，传达英美商团恫吓；林则徐愤然答曰：打仗不怕！

鸦片战争中的美国谋士

——《中国丛报》主编裨治文

应邀观看虎门销烟

1839年6月3日，广东虎门硝烟四起。这天早晨，随着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一声令下，近2万箱从英商手中收缴的鸦片在这里被销毁，引得各界人士纷纷前来观看。在被邀请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中，有一个身穿黑色教士袍的高大美国人格外引人注目，他站在林则徐身边，不停地用熟练的汉语与林交谈，询问清政府禁烟政策的细节；一会儿又举起一个长筒望远镜，仔细观察海滩上销毁鸦片的场面，显得十分活跃。这个美国人就是当时在广州出版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的主编裨治文（E. C. Bridgman）。

自从马礼逊开外人在中国办报之先河以来，英美等报业发达的国家在最早的通商城市广州创办了数种报刊，毫无疑问，英文报刊中首先登场的照例是出版周期较长的月刊，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832年问世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该刊因受广州基督教联合会与美国同孚洋行的经济支持，兼有一批外国在华宗教、政商

知名人士积极撰稿,印数很快上升,自第 5 卷起每期超过 1000 册,行销于中国、英美及亚洲各地。因此,虎门销烟当日,林则徐也向该刊的主编裨治文发出了邀请,意在通过这家刊物的报道,向英美政府表达他“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的决心。

裨治文是美国公理会派赴中国的第一名传教士,他本人在中国度过的 30 余年可以说代表了西方传教士初以在华传播宗教为目的,继而创办报刊谋求更大影响,最终踏入政界成为本国在华利益维护者的共同经历。1829 年 10 月,他得到美国商人奥立芬赞助,免费搭乘从纽约往广州的货船于次年 2 月抵穗,最初就住在奥立芬设在广州的公司里。据称,该公司是当地惟一不输入鸦片的洋行。在穗的头两年,裨治文先随城内惟一的外国传教士马礼逊学习汉语,他悟性甚高,每天往马礼逊的寓所受其耳提面命,夜晚靠一部《华英字典》刻苦自学,不出一年功夫,便能以熟练的汉语与华人教徒通信,还能操广东方言同街头小贩讨价还价,深得马礼逊赞赏。有了语言这得心应手的工具,裨治文如鱼得水,不久由奥立芬提供经费和场所,借美国公理会运来的印刷设备,创办了《中国丛报》。他创办此刊的目的在于搜集、提供有关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资料,以帮助在华的外国人了解各种情况,甚至为本国制订对华政策出谋划策。在以后数年里,《中国丛报》尤以详尽报道鸦片战争之进程而声名鹊起,迄今仍以载有丰富的史料为中外学界广泛重视。

裨治文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冒险家,1826 年他从马萨诸塞州大学毕业后,一心向往去东方冒险,为传播西方文化开辟新的疆域;为取得出国资历,他又在安多弗神学院苦读了三年《圣经》,方获得教会的允许被派往中国传教。但裨治文意不在此,传教士对他

来说只是一件外衣而已，他的真正兴趣还在于如何通过恰当的手段去影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实现个人的理想。最后，他选择了创办报刊这一几乎无人问津的路子，不仅利用舆论工具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出谋划策，在当时居穗外国人很少的情况下，还利用报人身份在沿海四处刺探、搜集情报，充当起了在华瞭望哨的角色。如早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丛报》登载的《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一文曾向读者透露，根据最近他派人在沿海的侦察，“天朝的联合舰队无能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商船”，这说明“中国虽然是一个辽阔的国家，却是一个极端孱弱的国家”。由此文章得出结论说：

首先，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将一无所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在这篇文章后面，裨治文还加了这样一段编者按：“我们完全同意我们的通讯员所说的我们还是要学会怎样对付一个高傲、半开化、专横的政府。……我们是主张采用有力的和果断措施的鼓吹者。”在这里，这个冒险家挑动美国政府侵华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裨治文还是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时代的热烈鼓吹者。1836年，他在一篇评论清朝军事力量的长文中，一开始就提出：“今天，作为评价各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标准，最正确的大概是：每个社会在‘杀人技术’上的精湛程度，互相毁灭的武器的完善程度和种类多少，以及运用它们的熟练程度。”同年8月，他还在《中国丛报》上刊登了他的一名通讯员在观察广州、虎门一带的炮台后的印象记：

它们不过是属于幼稚阶段的堡垒建筑的样本，没有壕沟，也

没有梭堡、斜堤或如何反击的防御工事。……河岸上的炮台都是裸露的，没有一个能抵挡得住一艘大型战舰的火力，或可以抵御在岸上与战舰配合的突击队的袭击。而突击队总是从它们炮火所不及的侧面和后方找到最佳的据点来袭击他们。

向林则徐发出战争威胁

史学家认为，1832—1851 年间刊行于广州、澳门、香港等地的《中国丛报》，出版长达 20 年，凡 20 卷，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代表了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水平。我们知道，中西文化的交流史是由一部《马可·波罗游记》拉开帷幕的，明末清初，虽间或有耶稣会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并以一技之长成为里程碑式的人物，如意大利人利玛窦钻研中国语言文化、德国人汤若望监造火炮、比利时人南怀仁推行西式历法等，但总的来说，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仍处于十分幼稚和模糊的阶段。到了以马礼逊、裨治文等为代表的新教传教士的时代，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识，无论在学术文化素养还是在社会政治分析能力方面，显然都有了一个新的飞跃。这一点，从裨治文撰写、连载于《中国丛报》的长文《广州城概述》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在向西方读者介绍了清政府的官僚体制和广东地方政府的官员设置之后，裨治文对此有这样的评论：“有一些秘密的法则，在支配着这个复杂的系统，使之能够存在，并能维持运作。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武，一是文；可能就是调节和制约中国政府各种措施的主要力量。”在记述清代的科举制度、学校和书院时，他又有以下结论，说这个庞大的帝国“现存的恢宏博大，主要应归功于它特有的文化机构。这些文化机构，尽管它们是这个民族的荣耀和力量，但除了纯粹为政治目的服务外，还存在着惊人的缺陷”。

在此文中，裨治文透过广州俯瞰全中国，其目光和笔触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吏治的腐败、军备的废弛、民生的困顿及教育的落后等等都有所涉及，可谓独出心裁，又不无真知灼见。这说明他是以一个具有较高学术文化素养的传教士的眼光，洞察了清帝国这个表面上的庞然大物已经潜伏着的严重的社会危机，这是他积极鼓吹侵华战争并预言这个“极端孱弱的国家”在未来战争中必败的理论基础。

也正是这样，在赤裸裸鼓吹战争的同时，裨治文对英美商人大量走私鸦片的勾当不仅不予指责，反而应鸦片贩子的要求，在《中国丛报》上刊登了一系列建议以武力保护鸦片贸易的舆论。1839年3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广东禁烟，勒令外国烟商在三日之内缴烟、具结；在遭到抵制后，旋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派兵严守广州城外的商馆区，撤退华籍仆役，并断绝供应，迫使英美商人交出了所藏大量鸦片。6月，在参观虎门销烟现场之后，裨治文报道了当日销烟的壮观场面和与林则徐的交谈，称林是清政府禁烟政策的忠诚执行者。同时，他还又一次预测了战争的来临。

1839年9月，即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裨治文再次拜访林则徐，提到了战争威胁一事，并转达了英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等人的恫吓，林答之以“打仗不怕”。此语在《中国丛报》上公布不久，即引起在穗英商注意，引发了中英在广东沿海的一系列小型冲突。根据当时的通讯条件，从中国沿海至英国伦敦的书信需要4个月之久，据史家判断，英国政府的侵华决定，就是根据这时的形势，包括裨治文与林则徐的谈话结果而作出的。而此时，义律被困在商馆期间向英国外相巴麦尊所发出的第一封求救报告已传到伦敦。不久，英军的炮舰和团队从英国本土、南非和印度源源

不断地驶往中国。9 个月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

脱去教袍，拿起枪炮

战争期间，裨治文又撰文建议道，美国应不失时机参加对华战争，压迫中国屈服。越数月，美国所派两艘军舰抵达中国海面，为英军助威，裨治文即放下手中之笔，充当美舰队司令尼加的翻译，成为后来美国制订对华政策的重要谋士。1844 年 2 月，以顾盛为首的美国代表团抵达澳门，与中国政府交涉战争赔款，裨治文应聘任其秘书和译员，直接参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拟定。此间，其《中国丛报》主编一职，由负责印务的传教士卫三畏接任。

至此，在裨治文的苦心经营下，《中国丛报》已从当地此起彼伏的外文报刊中悄然崛起，到 1851 年 12 月停刊时，成为鸦片战争前后由外人创办的出刊时间最长、内容最广、影响最大的新闻刊物。在广州出刊的 20 年里，它以所有在华的外国人为服务对象，介绍了中国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字以及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变化，报道了中国政府的动态，以及可靠而有经济价值的情报和外国人在华活动的消息。再者，该刊所搜罗来的大量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情况，在当时成为西方政府及商界研究中国、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参考资料。尤为重要的是，在鸦片战争前后，由于美国政府对华十分缺乏了解，它当时对华采取的一系列外交政策，都取自《中国丛报》的建议；甚至中美 1844 年 2 月在澳门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中的许多内容，如准许美国人在“五口”建立教堂、购买中国书籍、聘用中文教师等等，都是听从了时任美国代表团译员的裨治文之意见，而一一列入的。

纵观裨治文在华的奋斗经历，平心而论，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勤勤恳恳、忠于职守的传教士。当初，美国公理会交给他

的任务是来中国传教，由于环境限制，他不得不另觅途径，从创办报刊入手，充当了向西方社会通风报信的角色。特别在战争的风云中，他更是改头换面，大显身手，不仅脱去教袍，也乘机告别了新闻生涯，从此踏入政界，直接为争取美国的在华利益效力，这也是那个混乱的时代里时势造“英雄”所致。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裨治文再次充当美国公使列威廉的翻译和谋士，为美国与清政府交涉、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献策及代译各种重要文件，为此受到其雇主的称赞。列威廉在给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中曾这样评价裨治文在鸦片战争中所起的作用：“1844 年帮助顾盛将军处理公务的译员和助手都是这些教士，曾在 1853 年及 1854 年担任过马礼逊和麦莲主要助手的裨治文，现在仍旧极有贡献。”而获得这种评价，正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冒险家来华奋斗一生的初衷。

一个是忠王李秀成的战友，
同情革命，追随太平军转战江南
四年之久；

一个是天王洪秀全的早年导
师，辗转相会，却因信念不同而
分道扬镳。

“太平天国的洋兄弟”

——报道太平军的吟喇和罗孝全

在鸦片战争后，一批又一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在记录近代中国历史风云的同时，也写下了自己的故事。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最初都是怀着仰慕中国悠久文明的心情，想来实地印证自己的梦想，未料踏上这片远方的土地后便留恋忘返。有的人一生与中国结缘，谱写了国际主义的友谊篇章；有的人全身心投入中国社会的重建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一部分外国记者为报道中国革命还付出了生活、事业、前途乃至生命的代价。在百年间陆续来华的大量外国记者中，这类记者虽然只有少数，但他们的行动却是中国报道成长史中不平凡的一页，值得我们珍视和纪念。

在这一类人物中，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主要对象是服务于各种媒体的职业记者，而未及考察人数同样众多的见证人、业余记者和著作家的报道活动。其实，他们的作品作为中国报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地位和影响力也是不可低估的。在这方面的传世之作，既有不少像英国妇女阿尔奇博特·立德¹⁹世纪末在中国

的见闻录《穿蓝色长袍的国度》,辛亥革命前西方观察中国的代表作、美国社会学家 E. A. 罗斯记录东西文化冲突的《变化中的中国人》这样的总结性作品,也有大量像吟喇 (A. F. Lindley) 的《太平天国亲历记》、丁韪良的《北京被围记》这样记述作者本人在重大事件中经历的精彩纪实。到了本世纪革命爆发和不断发展的年代,更有像英国科学家班威廉、克兰尔夫妇所著《与中共相处的两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披露中国革命内幕的畅销读物《中国的双星》。这些开拓性的作品,对促进当时外国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其中,英国人吟喇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报道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

吟喇：与忠王李秀成结下友谊

吟喇于 1859 年夏来到香港,在英国海军里服役,是一名下级军官。他来华的第二年春天,太平军在天京外围打垮了清廷的江南大营,乘势夺取常州、苏州和嘉定后,正上海进军。为了了解太平军的真相,刚到上海不久的吟喇弃军职而从商,成为一艘航行于上海附近内河收买蚕丝的小轮船上的大副,这使他有会深入太平军统治区观察实情,结交朋友。1860 年秋天,吟喇的轮船带了约 4 万两银子在松江一带冲破清朝炮艇的拦截,向太平天国统治区驶去,一路上,太平军区域内往来兴隆的商船、田间丰收的谷物以及生机勃勃的革命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轮船停泊于苏州附近采购生丝期间,他特意进城去拜见忠王李秀成。当日,李秀成刚在上海城外与清军交战,撤兵归来,他本人的面部也被横加干涉的英舰大炮击伤,但他还是立即在王府内接见了吟喇,引为至交,作竟日谈。在离开苏州之前,吟喇把志愿为太平军服务的想法告诉了忠王,忠王即委任他一个名誉职务,保

证其在太平天国境内往来不受阻挠，去做他认为最应该做的事。呤喇投奔太平军后，开始在《中国之友》等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太平天国的治国理想，还会联络有名的西方传教士到天京参观，以争取国际支持；后来终于发展到为太平军购办军火、供应粮食，并偕未婚妻和几位友人投奔忠王，为其教练军队，并带炮队参加作战达 4 年之久。

这 4 年中，呤喇最引人注目的一次作战行动是 1863 年 11 月，他奉忠王李秀成之命，在太湖水域上俘获了英美“洋枪队”的一艘名叫“飞而复来”号的战船。这件事曾被当时的外国报刊争相报道，呤喇在其作品中也作了生动、详细的记述。当时，由英国人戈登率领的“洋枪队”驾驶轮船游弋在太湖上，配合清军围攻太平军占领下的苏州，十分猖獗。忠王命呤喇带一队人相机截获敌人战船，以增强太平军的水上作战能力。

11 月 14 日夜，呤喇率兵已潜入上海，他后来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一书中这样描写道：“江潮已退，月亮隐藏在镶着银边的云层后面，正在逐渐地沉落，黯淡的星光笼罩在蒙蒙的水汽之中，江面烟霏茫茫，我们的两艘小船在夜幕中前进着。”接着，呤喇以某家报馆记者的身份登上有名的“飞而复来”号，在同毫无戒备的欧洲军官交谈中，他探听到船上关押着几名被俘的太平军首领，当晚将引渡给清军大本营时，即果断地向事先掩蔽在附近的两只小船上的太平军战士发出信号，不一会儿，“我的一队人由船头右舷登船，另一队人由左舷登船。我们的人一下子就钩住了汽轮的船边，携着刀枪爬过了舷樯几个站岗的哨兵和一个在甲板上的马尼刺人被我们抓住的时候，既没有进行抵抗，也没有发出喊叫”，呤喇等人开动轮机，逃离英国炮艇的追击，越过清朝的统治区，急速向太平天国境内驶去。